



夏光

大凡看过京剧《沙家浜》和沪剧《芦荡火种》的人都知道，里面有个主角是新四军指导员郭建光。郭建光的艺术形象光彩照人。京剧《沙家浜》里很多人物都有原型，比如阿庆嫂、胡传魁等。它的故事就取材于江苏常熟阳澄湖畔芦苇荡中，新四军36名伤病员英勇抗敌的真实历史。这36名受伤战士的指挥员正是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毕业的学生夏光。

夏光——

《沙家浜》郭建光的原型

◎王 谦

武昌农讲所聆听毛泽东讲课

夏光，1909年11月29日出生于湖南省武冈县。1926年，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各地农

民运动迅猛开展起来。当时在县中学读书的夏光深受影响和鼓舞。7月从县中毕业后，就立即投身到大革命的洪流之中。1926年10月，北伐军攻占武汉三镇，武汉成为大革命中心，时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的毛泽东提议在武昌举办一所大型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来培训一大批农运骨干，以解各地急需农运干部的燃眉之急。为了尽快筹备武昌农讲所，毛泽东亲赴湖南、湖北、江西三省国民党党部，得到三省党部的支持，组织农运骨干和其他进步青年到武汉参加入

学考试，年仅17岁的夏光是湖南方面的报考青年之一。

在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毛泽东作为该所常

杨向群1986年出版的专著《可列马尔可夫过程构造论》，被誉为世界科研专业名著，全书除第1章中必须引用前人的结果外，其余基本上都是杨向群本人的研究成果，其中新得到的结果目前国际上仍然是领先的。本书主要采取概率方法和分析方法相结合，这种结合是杨向群所首创和系统使用的。著名概率论专家、英国皇家学会院士、剑桥大学教授D.G.Kendall为该书英文版作序。序中写道：“这部专著首先井井有条地阐述了马尔可夫过程的基本结构，接着在后面的篇章中进一步阐述了主要是杨向群自己的以及其他几位中国学者新近研究的先进的学术成果。”著名的概率论专家P.G.Pollett在Annals of probability杂志上撰文对该书进行评价：“杨的书的英文版的出版是及时的，它与西方的研究者在构造论中重新燃起的兴趣相一致。本书报告了近二十年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概率论学者作出的激动人心的成就。”英国Wiley & Sons出版公司在新书介绍中也写道：“一本该领域中延伸到研究前沿的新

书。构造论是马尔可夫过程理论的核心课题。杨向群是一位卓越的中国学者，他处于该领域的前沿。”杨向群和学生合著的《两参数马尔可夫过程论》出版后也受到高度评价：“本书在多参数马尔可夫过程的研究领域中，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是该领域不可多得的优秀理论专著。”《科学通报》杂志有专文评述：“专著全面总结了这一分支在国内外的研究进展。当然，大部分成果是作者自己获得的。该书是当前国内外研究多参数马尔可夫过程的唯一专著。本书对两参数马尔可夫过程的研究建立了一个基本的理论框架。”

杨向群教授的研究工作长期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基金资助，得到国家教育部、湖南省人民政府以及所在工作单位和同事们的大力支持。目前，他与他的学生们一道，从事马尔可夫过程爆发后的性质研究，保险和数理金融的理论及其应用研究。

老骥伏枥，壮心不已。我们祝愿他在新的征途取得新的科研成果。✕

务委员，实际主持教学，并担任农讲所《农村教育》、《农民问题》这两门主课的教员，还向学生们讲授《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夏光在这里聆听了毛泽东、瞿秋白、李立三、彭湃、方志敏、李达等革命家和国民党左派人士的讲课和演讲，思想觉悟得到很大提高。在这里，农讲所学生实行军事编制，800 多个学生编成一个总队，总队下设区队、大队，每天进行两个小时军事操练，每周到郊外进行军事演习一次。通过学习革命理论和军事训练，夏光成为能文能武的农运骨干，并在农讲所学习期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7 年 6 月 19 日，武昌农讲所举行毕业典礼，每个学生都得到一枚铜质五角星形毕业证章。学生毕业后，大多以各省农民协会特派员的身份回到自己家乡从事农民运动。夏光被党组织派回武冈县，从事恢复党组织工作。

临危受命组建“江南抗日义勇军东路军”

1928 年初，中共武冈县党组织遭到破坏，夏光被迫出走，遂与党组织失去联系。1928 年、1930 年，他曾两次被国民党反动派监禁，后保释出狱。1937 年 10 月，经徐特立介绍，夏光参加了平江游击队，后编入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一团，他任该团二营军事教员。1938 年 5 月，一支队在陈毅的率领下，由皖南东进，开赴苏南茅山地区。这期间，夏光由营长吴泳湘、副营长王义顺介绍，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10 月，夏光又调任三支队六团作战参谋。

1939 年 5 月，六团奉命改为“江南抗日义勇军”，由总指挥叶飞率领来到苏常太地区，向敌后发展抗日根据地。时任作战参谋的夏光，积极协助总指挥工作，打击日、伪军，争取发展地方武装，孤立不抗日的国民党忠义救国军，不断扩大抗日力量。为了广泛发动群众，夏光兼任新开办的教导大队大队长，对要求参加新四军的贫苦农民和青年学生进行短期军政教育，培养军事人才。他还协助总指挥，积极对争取过来的地方武

装进行收编，使江南抗日义勇军不断壮大。不久，江南抗日义勇军整编为五路，夏光任第五路参谋长。至此，江南抗日义勇军由原来的 600 多人发展到 4000 余人。1939 年 9 月，为团结抗战，避免与国民党军磨擦，江南抗日义勇军奉命西撤。当时夏光由于连续作战，经常彻夜不眠，患了眩晕症躺在床上不能动。经领导研究决定，让他暂时回阳澄湖地区休养。夏光随即将所有作战文书记录全部交给参谋处，化装成便衣，带了个通信员，通过忠义救国军控制地区，回到濒临阳澄湖的肖泾、陆巷，在我军后方医院与“江抗”政治部主任刘飞等治病养伤的同志会合。

那时所谓的后方医院是到处流动不定的，芦苇荡和群众家里就是病房，生活十分艰苦。在雾蔼沉沉的阳澄湖畔，原来分散隐藏在芦苇各处的后方医院伤病员逐渐集中起来，由中共常熟县委安置在董浜附近一片密密层层的芦苇丛中。医院里有几十个伤病员，还有一些医护人员，总数 100 人左右，完全没有武装掩护。日伪军到处搜捕新四军伤病员，忠义救国军特务武装和土匪也要追赶这批伤病员，以作投敌的准备。日伪匪四处骚扰洗劫，周围的形势异常险恶。伤病员白天只能借着秋阳睡一会，每天要等到天黑才能吃到乡亲们送来的饭菜。有多少个“沙奶奶”、“阿庆嫂”、“沙四龙”冒着生命危险掩护、保护、悉心照顾这些伤病员。一次，驻守昆山的日军窜过阳澄湖，突然包围了隐藏在曹浜村的后方医院，撤离已经来不及了，乡亲们纷纷把伤病员隐藏在自己家中。沈河翠大妈一个人在家中柴草堆里藏了 4 个伤病员，机智地与前来搜查的日本兵周旋，临危不惧。交通员连柏生在执行任务时突然与一群下乡“扫荡”的日军相遇，他连忙躲进附近村子的一户人家。这家女主人是个年轻妇女，正在给孩子喂奶，她认识连柏生，见日军正在追捕他，急中生智把孩子递给他。日军追来了，指着连柏生问女主人：“他是什么人？”“他是我男人！”谁知话音刚落，她的丈夫从地里回

来了。日军见又来了一个男人，顿生疑心，拦住问：“他又是什么人？”女主人咬咬牙说：“我不认识他。”于是日军带走了她丈夫，从此她丈夫就再也没有回来。

在芦荡中，这些伤病员们不能生烟火，不能大声喧哗、唱歌，不能出港汊。阳澄湖的大闸蟹驰名全国，伤病员们经常见得到，却不能一饱口福。因为如果生吃要拉肚子，煮熟吃也不可能。因为在这里，只要一生烟火，日伪军便会追踪而来。因此，他们捉到的、别人送来的所有的大闸蟹，都被一只一只放回到阳澄湖中去了。秋雨连绵，湖水暴涨，他们被雨淋水泡，冷得浑身打颤。夜里不敢打盹，为了防止意外，他们只好手拉着手。就是这样，也还有个别的伤病员被湖水冲走而牺牲。药品奇缺，有的重伤员身体虚弱到了极点，好几个伤病员死于败血症。后来由地方党组织派两个党员设计从日伪军岗哨旁偷偷驶出小船，连夜把30多个伤病员转运到张家浜一带。

新四军江南抗日义勇军西撤后，东路的常熟县境内只留下夏光等30多名伤病员和当地武装常熟人民抗日自卫队（简称“民抗”）的一个班，青浦、嘉定等地方留下的少数人民武装，相互联系也很困难。东路大片地区又笼罩在日伪黑暗统治之下，一些地方的“草头王”重新拉起队伍，鱼肉人民。土匪流氓，又在蹂躏乡里。东路人民仍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人们热切盼望新四军“江抗”能再打回来。1939年10月，上级党组织派原常熟“民抗”部队的负责人杨浩庐返回苏常太地区，传达如下指示：为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江抗”主动西移待机。留在东路的部队人员与地方党配合，重新组织武装，坚持原地斗争。地方党组织和东路部队的负责人随即在东唐寺镇附近召开会议，由地方党特委代理书记张英主持，参加者有“民抗”负责人任天石、薛惠民，常熟县委书记李建模，苏州县委书记翁迪民等人，夏光作为伤病员的负责人出席了这次重要会议，会上决定成立“江南抗日义勇军东路军”

（简称“新江抗”）司令部，推举夏光任司令，杨浩庐任副司令兼政治部主任。1939年11月6日，“江南抗日义勇军东路军”司令部在常熟县东唐寺成立，这是一支新的“江抗”部队，也就是新四军六师十八旅的前身。

“芦荡火种”越烧越旺

“江南抗日义勇军东路军”的成立，重新燃起了东路武装抗日斗争的火焰。“新江抗”的旗帜一竖起来，常熟等地人民奔走相告：“江抗没有走，救星共产党又回来了！”“江南抗日义勇军东路军”司令部虽然成立了，但是摆在夏光等领导人面前的困难是很大的，一是缺人，二是缺枪。他们首先把留在后方医院已痊愈的十多位同志，组编成一个排。上海党组织动员了几批青年学生和工人、店员下乡，充实为一个特务连。同年12月，常熟人民抗日自卫队将当地常备队组建了一个连，编为“新江抗”第一连。1940年初春，驻太仓县境内的国民党“江苏省保安第四团”被日军击溃，伤亡惨重，其三营营长郭曦晨和连长李超，目睹共产党部队积极抗日、爱国爱民的事迹，在我党组织的帮助下，率领余部80多人打捞、收集近百支枪，要求“新江抗”帮助整顿。夏光等“新江抗”领导人率特务连冒严寒赶到太仓岳王市，带领他们转移到常熟境内。这80多个人百来条枪编为“新江抗”第二连。当地人民自卫队也纷纷要求与“新江抗”合并，“新江抗”在短短几个月内就发展成了一支500多人的队伍。经过几次战斗，“新江抗”不断壮大，打得日伪军缩进沪宁沿线的大据点里不敢出来。

“新江抗”成立的第二天，在夏光的率领下，就伏击了日伪军在东唐寺一带抢粮的汽艇，敌人狼狈逃窜，群众欢欣鼓舞。1939年12月上旬，地方顽固派孙纪福部勾结匪伪窜犯东唐寺，“新江抗”和“民抗”紧密配合给以迎头痛击，毙俘其十多人，缴获十多支枪。地方顽固势力的气焰大为收敛，人民群众对“新江抗”和“民

抗”更加信任拥护。1940年2月8日，这一天是春节，驻昆山、巴城的日寇警备队60余人和一部分伪军突然出动，分别乘小渔船利用晨雾悄悄地接近洋勾娄村。此时，夏光的部队于头天除夕伏击了日军汽艇，深夜来到洋勾娄村宿营，正在为群众张贴春联，准备第二天与群众联欢。春节上午8点左右，日伪军的小渔船陆续从芦苇丛中向村庄靠拢，一部分敌人正在开始着陆，夏光部队带哨的干部发现后立即鸣枪报警。部队仓猝投入战斗。洋勾娄四面环水，村庄地形复杂，但是竹林、房墙和屋基前后堆放的土坯能作为我方依托。双方都是背水作战，夏光沉着指挥部队边打边架桥转移。特务连从侧翼迂回，和敌人进行逐屋争夺。敌伤亡20多人，日警备队长萨依岛等被击毙，日伪军被迫撤离。夏光部队也牺牲了10多位官兵，10多人负伤。这次战斗与敌人激战近3个小时，大大锻炼了部队战斗力，提高了军民战斗胜利的信心。

在夏光等人的领导下，“新江抗”在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下，正视周围环境，积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依靠人民群众，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京剧《沙家浜》里的“胡司令”胡传魁，其生活原型就是胡肇汉，湖南岳阳人，抗战前先后混迹于国民党警界，任过江苏省第一区水上警察队中队长、青浦县水巡队长等职。抗战爆发后，他要弄阴谋采取灭主夺权的方法，将阳澄湖里一支游击队掌握在自己手中，自封阳澄湖游击队司令，称霸一方，无恶不作。“江抗”东进时，为壮大抗日武装，扩大抗日统一战线，叶飞曾同胡肇汉谈判，将胡部收编为“江抗”四路独立第一支队，任命胡为支队司令。但是，胡肇汉匪性不改，在“江抗”西撤时请了病假，回到阳澄湖重拉武装。国民党忠义救国军得悉内情，便派人做其工作，要他接受忠义救国军收编，并许愿委任其为“先遣支队司令”。当时驻常熟、苏州边境的胡肇汉部队，与“新江抗”互存戒心，夏光等人为了尽可能争取他团结抗日，遂委他为

“东路副司令”，并同意他在西阳澄湖一带征税活动。以后的几个月，胡肇汉的态度有了明显转变，与“新江抗”保持着经常的联系。当“新江抗”活动到胡部区域时，胡还能提供一些给养。事实证明做好对胡肇汉的争取工作，缩小了对立面，避免了顽固势力向阳澄湖地区渗透，对“新江抗”在苏常地区坚持斗争起了积极作用。

1940年4月，为了加强对东路军的领导，新四军军部派谭震林到东路负责全面工作，将江南抗日义勇军东路军改为江南抗日救国军。5月，将部队整编为3个支队，夏光任参谋长兼第一支队支队长。这时他一方面积极配合谭震林开展工作，一方面率部狠狠打击敌人。6月6日，他率领一支队一日三战，破坏了敌人的交通和通讯设备，捣毁伪军据点，毙伤日伪军60余人。不久，又率300余人，将国民党江苏保安六纵队的赵、马三支队大部歼灭，缴获机枪几挺、步枪几十支。同时，他还协助谭震林积极开展统战工作。当时无锡甘露、荡口一带游击队首领杨忠，对江南抗日救国军的态度时冷时热。8月的一天，谭震林由夏光陪同，仅带7名短枪班战士，冒酷暑亲自到甘露镇与杨忠会面。杨忠一面派人到街上张贴“欢迎江抗谭司令”的标语，一面亲率数十名部下全副武装分列两旁。谭震林、夏光等步入客厅坐定后，便直截了当地对杨忠说：“我们来会面是心诚意切的，如你愿意真诚合作，我们十分欢迎，如你们要兴动干戈，我们也不示弱。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嘛！”杨忠慑于江南抗日救国军的声威，表示愿意合作。第二天，双方700多人在甘露镇召开了联欢会。11月，谭震林、夏光等又率部和平收编地方武装杨行之部，将杨部改为沙湖常备队。这样，就使抗日力量迅速得到扩大。是月，江南抗日救国军扩编为3个纵队，夏光任第一纵队纵队长。

谭震林在1940年11月6日新“江抗”部队诞生一周年之际，撰写纪念文章《东路一年》，高

度评价了夏光在新“江抗”发展壮大过程中的殊勋。他说：“我们能够获得这样的成绩，当然有着许多的原因。然而如果没有夏光同志独当一面的斗争精神，和机智灵活应付当时的环境，那么就不能够有今天这样顺利的发展。我们东路的全体同志，应该学习夏光同志这种斗争精神，这种斗争决心。”

1941年“皖南事变”后，江南抗日救国军改编为新四军第六师，六师下辖十六旅、十八旅，夏光任十八旅参谋长。7月，日伪集结一万五千兵力，对东路地区进行大规模“清乡”，夏光带领部队，坚决进行反“清乡”的斗争。8月，他指挥祝塘战役，毙伤顽军和伪军80余人。此次战斗中，五十四团一营教导员商健民在组织部队反冲击时头部中弹牺牲，一营在反复冲杀中迅速转移。忠义救国军占领村庄后从商健民口袋里搜出一枚牛角印章，上面刻有“夏光”二字。他们象汉军争夺项羽头颅一样，非常得意，以为是毙杀了夏光，忙割下商健民的头颅，到上司那里请赏。汉奸汪精卫的伪政权大喜过望，迅即在《国民新闻》发表“匪首夏光中弹毙命已证实”的消息。足见他在敌人心目中的震慑份量。

从沪剧《芦荡火种》到京剧《沙家浜》

新中国成立后，由36个伤病员为基础组成的新四军江南抗日义勇军东路军的战斗故事，先被改编成沪剧《芦荡火种》在上海表演，在戏剧界和观众中引起了广泛兴趣和强烈反响，随即迅速在全国走红。《芦荡火种》的诞生，可追溯到一首军歌，这就是诞生在抗日烽火中的由过鉴青作词、黄韦谱曲的《你是游击兵团》：“阳澄湖畔，虞山之麓，三九年的寒冬，三十六个伤病员，高举共产党的旗帜，在阴影笼罩的鱼米之乡，流着血啊流着汗，辛苦的耕耘着……你的威名震撼了

江南，你的钢刀刺破了敌人的心房……”歌中讲述的是1939年叶飞率领的以新四军第六团为主的江南抗日义勇军离开苏常地区后，留下的三十六名伤病员在地方党和群众的支持帮助下，不畏艰苦，重建武装，坚持抗日的斗争事迹。这也是最早歌颂三十六个伤病员英勇事迹的文艺作品。这首歌于1943年首次演唱后，三十六个伤病员的故事便随之流传开来，并出现在许多文艺作品中。其中，最为详细的要算战地记者崔左夫在新中国成立后写的那篇纪实文学《血染着的姓名——三十六个伤病员斗争纪实》了。据崔左夫回忆：那是1948年11月13日，他在采访淮海战役时，曾是当年三十六个伤病员之一的华野一纵队司令员刘飞指着打扫战场归来，正高唱《你是游击兵团》的一支部队深情地对他说：“这个团的前身是新四军十八旅五十二团，最早的一批战斗骨干是留在阳澄湖畔芦苇荡里的‘江抗’伤病员，他们的经历，以后你还可以写一写呢……”尽管由于当时正值解放战争最为激烈之时，崔左夫没有时间顾及这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但他记住了刘司令的话。1957年6月，崔左夫专程在苏州、无锡、常熟、太仓等地采访了两个多月时间，写出了纪实文学《血染着的姓名——三十六个伤病员斗争纪实》。

1959年，上海市人民沪剧团团长陈荣兰和编剧文牧正准备着手创作一个反映江南新四军艰苦奋斗的现代沪剧时，偶然看到了崔左夫的《血染着的姓名——三十六个伤病员斗争纪实》，大受启发，就此创作了现代沪剧《碧水红旗》。沪剧根据人物出场的需要，把36个伤病员改为18个，并参照许多相关历史资料，以革命回忆录所记述的发生地为轴心，融进了大量的真实事件，精心塑造出郭建光、阿庆嫂、沙奶奶、胡传魁、刁德一等性格突出的正反人物形象。1960年公演时，剧



京剧《沙家浜》郭建光剧照

名更改为《芦荡火种》，由著名沪剧演员丁是娥扮演剧中女主角阿庆嫂，邵滨孙扮演剧中男主角郭建光。革命现代沪剧《芦荡火种》在上海隆重上演了，演出获得了很大成功。沪剧《芦荡火种》的成功为后来的京剧《沙家浜》打下了很好的底子。

可是，身为该剧主人公原型的夏光却一点也不知情。直到有一次，夏光到上海，一位老战友给了他一张《芦荡火种》的戏票，让他一定要去看看。这是他第一次看《芦荡火种》，他越看越激动，很惊讶：这些内容自己怎么这么熟悉，这个人物怎么跟自己这么像，他最后看得都流泪了。

1964年初，《芦荡火种》去北京公演，被北京京剧团一眼看中，由著名作家汪曾祺与杨毓珉执笔，改编为京剧。演员阵容十分强大，阿庆嫂用A、B角，赵燕侠、刘秀荣轮流演出（后由洪雪飞饰阿庆嫂），郭建光由谭元寿所饰演，此人为谭派传人，功底亦厚。对反面人物的角色也作了精心的策划，分别由周和桐、马长礼扮演胡传魁、刁德一，果然更能衬托出阿庆嫂和郭建光的机智和英勇。梅花香自苦寒来，经过剧组全体人员的共同努力，《芦荡火种》终于以一种全新的姿态展现在京剧舞台上。1964年4月，现代京剧《芦荡火种》在北京正式公演，形成了轰动效应。以后《芦荡火种》又改名为《沙家浜》。继北京公演后，《沙家浜》又在全国进行巡回演出，所到之处，观者如云，好评如潮。1970年，《沙家浜》被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成电影纪录片。《沙家浜》也随之从城市走向农村，成为全国亿万观众一道丰盛的精神食粮。

夏光从来不说自己是《沙家浜》中郭建光的原型，他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不过是一个幸存者，沾了一个（郭建光的）光字，实际上这个人物是许多新四军指挥员的缩影。大多数人都牺牲了，我能幸存活下来，而且还活得不错，不容易啊，我很知足了。”

抗日虎将邹鹏奇

◎ 陈扬桂

“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这是当年为抗日青年军而作的著名诗句。作为青年军的后继者邹鹏奇，原本是一位声震寰宇的抗日虎将。从参加北伐战争开始，他身经二百余战，是有名的常胜将军。特别是在抗战时期，他担任275团团长，率部参加第三次长沙会战，全歼日军第13骑兵团，而被誉为九战区“老虎”团长。此后升任92师副师长，99师师长，99军

军长、陆军训练司令、总统府战略顾问等要职。他一生坚决抗日，多次率军杀日寇于全胜。现在庐山仍立有国民党99军抗日牺牲战士纪念碑。

邹鹏奇，这位出生于湖南省隆回县司门前锡婆溪的贫苦少年，从小十分懂事，为了帮助家里缓解一点困难，常常饿着肚子上山打柴，下水捉鱼。近代司门前，文化昌盛，是著名思想家魏源的家乡，学塾很多，家境好一点的孩子大多能进学堂念书，但他家却无能为力。邹鹏奇很想读书，就跟疼爱他的母亲求情。得到母亲允许后，他每天早出晚归做力所能及的农活，上学时间争分夺秒地攻读书本。夜晚，家里点不起洋油灯，他就用打柴时捡回来的松膏照明，松膏油烟极多，他的脸经常被熏成了“包公脸”。

那时读书的学费是弟子给老师送“束脩”。束脩就是腊肉。在生产十分落后的封建社会早期，孔子就规定学费的标准是十块腊肉。可是，邹鹏奇家里很穷，莫说十块，就是一块腊肉也送不起，只能送豆腐干子。这老师也很刻薄，在送肉的学生名字后面打个“O”，在送豆腐干子的学生名字后面打把“X”。邹鹏奇名字后面都是清一